

【文学研究】

丰收纪实文学的“崇高美学”与记忆景观

——以《西长城》为例*

邹 赞, 宋骐远

(新疆大学 新疆文献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 丰收是当代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其创作始终坚守人文情怀,注重将个体的人生命运故事有机融入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以丰收荣膺鲁迅文学奖的纪实文学《西长城》为文本对象,叙事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发现《西长城》是一幅布满新疆屯垦戍边历史记忆的景观地图。在这纵横交错、五彩斑斓的记忆拼图中,那些以口述史为创作素材的个案呈现,有意打破时序与空间,串联起兵团自成立至今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成为兵团记忆的当代文化生产范本。此外,《西长城》借助评论干预、“图一文”叙事等叙述手法,在充分展示具有地域风情的屯垦文化传承的同时,讴歌兵团人“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无私奉献精神。

关键词: 丰收;《西长城》;屯垦戍边;崇高美学;记忆景观

DOI: 10.13568/j.cnki.issn1000-2820.2021.02.012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20(2021)02-0091-07

正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建制上的特殊性,兵团文学也因其诞生于当代屯垦戍边的历史实践,以讲述兵团故事、传播兵团声音、构建良好兵团形象为主要目标,因此这种文学的叙事表征和审美风格也呈现出显著的屯垦戍边特色。兵团文学既自觉融入当代新疆多民族文学的斑斓图谱,也以反映兵团社会历史变迁和几代兵团人奋斗历程为旨归,在书写兵团农场日常生活、再现兵团人在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的心理调适、塑造兵团国际形象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如果按照文类划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影视文学等领域都收获了丰硕成果。以小说为例,兵团文坛涌现出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杨牧的自传体小说《天狼星下》,韩天航的《回沪记》《太阳回落地平线上》,施祥生的《天上有个太阳》《野麻滩》等。散文方面涌现出赵天益的《塞上听潮》《情醉旅程》,梁彤瑾的《青色乌伦古湖》,雷霆的《伊犁纪实》,曲近的《自言自语》等一批佳作。诗歌方面涌现出杨牧

的《我是青年》《复活的海》,章德益的《大漠与我》《绿色塔里木》,石河的《飞檄集》,李光武的《爱的罗曼诗》等力作。纪实文学创作达到了较高水准,丰收的《镇边将军张仲瀚》《蓝月亮》《铸剑为犁》《西长城》堪称典范之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兵团影视文学创作,有的是以原创小说为蓝本改编而成,有的则直接为影视剧拍摄而创作,代表性作品有韩天航的《母亲和我们》《我的大爹》《问问你的心》《牧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施祥生的《一个都不能少》,王伶的《化剑》,郭晓力的《遍地阳光》等等^①。这些作品结合不同时代的语境书写兵团屯垦戍边历史,尝试激活兵团初创期的文化记忆,为弘扬和传播兵团精神、筑牢兵团屯垦戍边文化认同提供重要的参照,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图景中散发出独特光芒。

如果把丰收(原名丰玉生)比作兵团文学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恐怕不会有人质疑或反

* 收稿日期: 2020-07-14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重点项目“新疆红色文化资源调查整理、保护传承与实践研究”(XJEDU2019SI004)。

作者简介: 邹赞(1979—),男,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大学新疆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①有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的轮廓勾勒,可参见雷晔、张吕《大漠魂的呼唤——对兵团文学创作现状的反思》,《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郭爱荣《新时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事业发展回顾》,《兵团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另可参见杨昌俊《新疆兵团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

对。这是因为,作为兵团第二代,丰收生在兵团长在兵团,那段在农场历练的悠长岁月已经凝成作家心灵深处的坚实情感,也是其从事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题材来源和情感动力。青年时代的丰收由于热爱文学,没有选择农机技术员的职业道路,而是通过努力考取了新疆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从事过记者、编辑、宣传干事、兵团作协主席等工作,虽然历经数次“华丽转身”,但不变的底色便是坚持文学创作。丰收三十多年来勤奋耕耘,始终如一地再现兵团、讴歌兵团、宣传兵团,用真挚的情感和出色的才华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绘制出了一幅幅底色厚重、鲜活生动的文学地图。

学界一般会将丰收定位为“兵团报告文学作家”^①。众所周知,报告文学被称为“文艺战线的轻骑兵”^②,特别注重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但报告文学不是新闻报道,因此有学者指出报告文学越来越凸显文学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新闻性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融为一体的,两者之间不可能机械地划出一个比例……在报告文学中,文学是显示真实事物的主要手段,因此,文学性越强,越有利于事实的报告,获得的艺术效果也越好”^③。近年来,随着“非虚构写作”^④的流行,人们更加倾向于以“非虚构文学”来命名那种以“民族志真实”(ethnographic authenticity)为主要特征的“在场式写作”^⑤。“非虚构文学”强调创作主体的直接参与,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由“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丰收本人具有兵团农场生活体验,并且常年坚持田野调研,因此他对兵团发展历史的呈现,对兵团人日常生活和人生命运故事的叙述,既是经验的在场也是情感的在场,可以称作一种“新型报告文学”或具有鲜明民族志色彩的纪实文学。

丰收的足迹踏遍天山南北,深入兵团农场和边境地区调研,搜集整理了大量口述史料,这些弥

足珍贵的田野资料成为其撰写纪实文学的第一手素材。三十多年来,丰收笔耕不辍,完成了《绿太阳》《最后的荒原》《铸剑为犁》《镇边将军张仲瀚》《蓝月亮》《王震和我们》《西上天山的女人》《珠穆朗玛的眸子》等纪实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大气磅礴全景式再现兵团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或以微观视角切入兵团人的生产生活,成为外界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兵团的一扇重要窗口。丰收的纪实文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2010年9月,丰收的《王震和我们》与其他五篇(部)作品同获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⑥。由丰收担任撰稿的电视纪录片《最后的荒原》荣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纪实文学精选集《还是那轮天山月》入选“名家新疆丛书”。2018年8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在京揭晓,丰收的《西长城》不负众望荣获报告文学奖,这也是“兵团作家首次获得鲁迅文学奖”^⑦。评论家雷达指出:“《西长城》的写作,涵盖了兵团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宏观的、全景式的。”^⑧作家沈苇也给予高度评价:“《西长城》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为中国屯垦史研究乃至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察提供了一个厚重而可靠的文本。”^⑨本文尝试以《西长城》为核心文本,综合运用叙事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解码文本蕴涵的“崇高美学”与“记忆景观”。

二

一如副标题“兵团一甲子”所示,《西长城》以兵团成立和发展的时间为总体线索,凸显每个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包括人物群体),但这种叙事框架的设置并没有陷入简单化的“串珠式叙事”,而是以主题来牵引各个时段的屯垦戍边历史事件。全书共分为“屯垦天山下”“酒

①丰收属于“兵团第二代”,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随后开始发表作品,其创作以中长篇报告文学为主,《六分之一疆土的呼唤》《绿太阳》等先后获奖,近代表作《西长城》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第六届“天山文艺奖”荣誉奖。丰收以兵团为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图景中占据独特的一席之地,恰如刘志友教授的评价,“在今天的中国文坛,像丰收这样特立独行的作家是不多见的。我之所以说丰收特立独行,是因为这位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在长达三十年的文学写作中,几乎完全不受这期间中国文学风云变幻、不断‘与时俱进’而‘华丽转身’的影响,始终拥抱着他唯一的对象世界——新疆生产兵团”。参见刘志友《塑造崇高美——论丰收的新疆兵团叙事》,《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第125页。

②报告文学常常被誉为“文艺战线的轻骑兵”“时代的晴雨表”。参见肖成韵《报告文学的真实与虚构》,《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第57页。

③有关“非虚构写作”的讨论,参见邹赞《“西部”影片与非虚构写作》,《山花》,2016年第3期,第119-122页。

④“在场式写作”强调创作主体的在场,文本以作家的亲历体验为基础,借助创作主体的视角观照现实生活变迁,具有强烈的介入意识。

与水”“家国·女人”“西部的浪漫”“西长城”“年轻的城”六卷,主题涵盖了新疆和平解放、兵团创立以及兵团成立后人口迁移、大生产劳动、兴修水利、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对兵团发展全貌的统摄和史诗般再现,具有宏大壮阔的艺术魅力。

“西长城”的书名极富隐喻和象征意味。“长城”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军事防御工程,随着历史的变迁,早已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深处,成为捍卫国家领土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象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缘政治位置极其重要。新疆和平解放初期,解放军战士和起义部队官兵是剿匪平叛、肃反肃特的中坚力量。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交恶,因此导致新疆的政治局势诡谲多变。由苏联一手阴谋策划和煽动的“伊塔事件”造成大量边民外逃,西北边境线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在这危急时刻,^①周恩来总理亲自召集王震、张仲瀚等开会,指示兵团“立即组织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分赴边境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尽快恢复生产”^{[6]396}。也正是在这样的危急情势下,兵团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意义被显现出来,一如张仲瀚所言,“一旦祖国需要,兵团的每一个拖拉机手都是够格的装甲兵”^{[6]402}。兵团职工自觉接受组织上的安排,拖家带口搬到边境地区接受“代耕、代管、代牧”特殊使命,后来又成为边境农场的第一批职工,任劳任怨扮演着戍守边境的“和平使者”。其中涌现出一批代表性人物,诸如革命烈士孙龙珍,等等。“大家两三个月里天天只能吃死面饼子,每顿的下饭菜就是野葱蘸盐巴,无法理发、洗澡,但执勤时却个个精神饱满,警惕性很高。”^{[6]401}这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精神诠释了兵团人的崇高品格。在这一意义上说,该书卷五的标题“西长城”可谓点睛之笔,其中涉及的“伊塔事件”和边境农场建设等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化再现,令人信服地证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

《西长城》的整体叙事基调凸显出宏大叙事特质,浓墨重彩渲染兵团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定国安邦的重大意义,旨在构建一部呈现兵团屯垦戍边历史的史诗性画卷。全书六卷内容分别侧重呈现兵团的不同面向,可以梳理出比较清晰的时间线索和事件脉络。但是在每一个主题的内部,叙述者有意颠覆线性时间序列,^②采取概述、省略、场景、拉伸、停顿等叙述时间策略^③,将个体的小历史有机嵌入兵团屯垦戍边的大历史,形成一种具有纵深意味的叙述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西长城》的扉页以两件对叙述者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为引子:一是叙述者回忆自己于1984年末收到一张寄自美国纽约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图片是一尊青铜雕像,名字叫“铸剑为犁”,叙述者由照片联想到人类对于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另一件事是叙述者回忆女儿对于“疆”字的文化解析,“左半边是一张‘弓’,‘弓’里边护着‘土’,这就是爷爷常说的‘屯垦戍边’……”^{[6]扉页}从叙事的意义上说,“扉页”所述并非赘余,它一方面有助于开启文本叙事的回忆/追述视角,另一方面提示我们在阐释兵团的历史与文化时应当具备国际国内的全局视野,在一种大格局中思考屯垦戍边事业的当代价值。我们不妨将目光聚焦卷六“年轻的城”之“雄关漫道”章节,这部分讲述兵团职工不畏艰险参与修筑中巴铁路的感人事迹。开篇从李克强总理2013年在巴基斯坦参议院发表的演讲谈起,由此引出阿里·马达德的故事,1966年阿里曾参与修筑中巴公路,见证了那段历史,并且坚持为那些在修路过程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守陵三十年。接下来叙述者花费大量笔墨铺叙中巴公路所处的地形地貌及其在历史上所扼的交通要塞地位。此处对历史文化背景的详尽阐述,如果参照文本的整体叙事模式,或可理解为叙事时间上的“拉伸”。对于修路过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叙述者有意采取“场景”策略,仿佛影视戏剧编导,将特定事件的细节一一描绘,旨在帮助读者了解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进而强化情感上的共鸣。比如对烈士王世杰在石坎塌方之际为了救巴基斯坦工友而牺牲自己性命的英勇举措

①当时刚刚经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极“左”思潮泛滥,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国家的整体形势也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

②这里不妨以“倒叙”为例:卷二“酒与水”先写新疆和平解放前前后后,再往前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欧美列强打着探险、考察、旅行等幌子在新疆开展活动。中国共产党积极与国民党斡旋,以民族大义感召陶峙岳等进步力量。花较多笔墨再现国民党起义部队在新疆和平解放之后的改编和思想工作。

③参见[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2-53页。

的描写：“千钧一发之际，王世杰一个箭步扑了过去，使尽平生之力把依不拉亨推出险区。刹那间，一声沉闷的撞击声撕破长空，一块巨石轰然而下，滚落抢险路段。大地颤动，尘土飞扬，王世杰的柳条安全帽被气浪抛向天空，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跌落百米外的山坡上。”^{[6]543}画面极富舞台感和镜头感，帮助读者深刻体会此情此景，对烈士的壮举产生一种崇高的审美心理。

叙事离不开人物，这里当然不是指叙述者这一角色，而是指叙述的功能和过程需要借助人物的推动作用。“人物描写总带有研究者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作为描写所表现出来的是隐含的价值判断。”^[7]《西长城》对于兵团屯垦戍边事业悲壮与崇高的审美表达，主要是通过塑造兵团人物形象来达成的。叙述者有意突破英雄史观，以摇镜头的观视方式，将兵团各行各业以及通过不同渠道进疆的兵团职工代表都摄取进来，尝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反映兵团群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心态。

其一，《西长城》巧妙借鉴了《史记》描写人物性格的“互见法”，即人物的性格特征无法通过某一具体事例或单独章节得以完整呈现，而是碎片化分散在许多章节，借助于旁观视角的观照，以“拼图”方式构建起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立体性。《西长城》对王震将军的性格展示，就比较典型地采取了“互见法”。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之间的故事并不截然区隔，而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出现，在交叉互现中塑造人物形象。叙述者首先以全知全能视角表现王震的性格，他热爱屯垦事业，像对待亲人一样关爱屯垦战士，“三伏天，王震将军去小拐。军用吉普车正停在田边，突然从玉米地里蹿出一群泥人。泥人们奔向将军：欢迎司令员！王震迎向泥人，握住他们的手，看着他们糊着泥巴的脸、胳膊、腿，说，你们这一身泥铠甲是防蚊虫吧？战士们齐声回答，是，司令员。王震动情地说，你们辛苦了……”^{[6]22}王震曾在战场上挥斥方遒、指挥若定、捷报频传，也曾经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后来又亲率解放军部队穿过河西走廊，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并在新疆和平解放后剿匪平叛，为确保祖国西北边疆安全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王震不仅是战争英雄，在领导兵团垦荒建设的过程中也充分展现了干事创业的魄力和眼光，他别具慧眼瞄准了玛纳斯河河水流向，带领部队在玛河流域垦荒造田，“一年一年

一年种野地，地名也叫出来了。玛纳斯河西边下野地大得很呀，上面还有上野地、东野地、西野地，中间叫中野地”^{[6]39}。此外，《西长城》还重视以特定的细节表现王震在日常生活中的和蔼可亲，比如与通讯团副政委谭克的见面，“一进门，王震就给了谭克一拳：‘谭克，你来了？’”^{[6]81}王震与新疆广袤的荒原一样拥有博大的胸怀，正是因为有王震这样的胸怀、魄力和眼光，兵团才能张开温暖的臂膀迎接从各种渠道进疆的人群。以王震为代表的兵团事业开创者，用实际行动印证了“兵团是座大熔炉”。

其二，《西长城》以“沙海老兵”“西上天山的女人”等特殊群体为叙述对象，从微观视角展示兵团战士（农场职工）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屯垦精神，从另一层面丰富了兵团人的形象塑造。该书对以刘来宝为代表的沙海老兵精神作了典型化展示：这些铁骨铮铮的男儿都曾是浴血疆场的英雄，随着国家整体形势的变化和边疆屯垦事业的需要，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下手中的枪炮，拿起坎土曼，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将贫瘠的盐碱荒地改造成万顷良田，书写了一曲现代屯垦戍边的史诗。

与此同时，《西长城》延续了“家国·女人”/“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丰收的《蓝月亮》《西上天山的女人》曾经关注过兵团女性群体，反复书写“家国·女人”的西部史诗。兵团创立前夕即面临如何解决战士的婚姻问题，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核心内容，因此王震等兵团领导人深谋远虑，积极争取内地省市的支持，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招收女兵进疆。丰收多年来一直坚持田野访谈，搜集整理了大量兵团女性口述史，将陶勇、陶先运、欧阳慧等湖湘女兵，江淑珍等山东妇女的人生命运故事穿插在文本中，尝试发掘兵团女性对当代新疆屯垦戍边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比如该书以四十七团老兵王传德和山东女兵王秀兰的夫妻情谊为例，生动表现荒原爱情的深沉博大：每年清明节（王传德）都要率领全家人采一篮杏花去看望老伴，“老兵王传德老了。他直了直腰，把老妻最喜爱的杏花撒在她的四周。望了望天，看了一眼地”^{[6]245}。《西长城》尤其注重凸显兵团女性的劳动者形象，这些来自湘水之滨的湘妹子到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住地窝子，啃窝窝头，在农场接受培训，有的成为女拖拉机手、护士或教师，从此改变人生命运轨迹，在天山脚下书写壮丽篇章。

其三,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兄弟民族在这片多姿多彩的土地上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团结互助、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西长城》以丰富生动的细节展示民族团结典型事例:铁匠艾买提祖辈三代为兵团屯垦战士打造坎土曼和镰刀,后来更是要打造拖拉机配件,为部队培养了一批批徒弟。维吾尔老人马木提恋家,在面对家园搬迁时有些犹豫不决,兵团战士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和情感,专门请示王震,王震立即批示:“故土难离呀,部队生产不能侵犯群众利益,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6]98}最后马木提被兵团将士的崇高觉悟深深感动,提出愿意主动搬迁,为了大家的利益放弃了香梨园,使得十八团渠顺利通水。为了改善细羊毛品种,陶峙岳亲自带着老兵去哈萨克牧民那里请教,后来又引进南京农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刘守仁,在实验开发细羊毛品种的同时,演绎出一曲感人的民族团结之歌——刘守仁和奴合曼之间的兄弟情谊,“说起紫泥泉,人们总会和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刘守仁联系在一起,刘守仁想说的,却是草原、细羊毛和他的牧工兄弟”^{[6]102}。此外还有车牌子(位于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一位名叫“团结”的维吾尔青年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时间上跨及三代人六十年,艾买提的妻子哈力卡姆难产,危急之中解放军农场医院的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医护人员和团部干部职工争先恐后献血,最后母子平安,新生儿就取名叫“团结”,“艾买提定了规矩,每年八一建军节全家去二十团探亲。这之后,每到八一建军节,艾买提一家一定会去二十团走亲戚。不是牵着羊,就是拉着瓜。到了古尔邦节、肉孜节,老朋友李干事,从妈妈肚子里取出团结的张玉兰医生,就往河西来了。你来我往,一直走到了今天”^{[6]107}。以上事例都是民族团结的鲜活例证。

兵团屯垦戍边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边疆实践,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表征,成为人们认识兵团、了解兵团、传播兵团精神的核心载体。丰收的兵团叙事始终凸显崇高美学,“丰收三十年之所以这样写,他苦苦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审美价值——崇高:他在兵团叙事这篇大文章中所做的全部功夫,就是四个字:塑造崇高”^[8]。《西长城》作为丰收纪实文学创作的最新收获,借助于对兵团屯垦戍边宏大叙事和兵团

人人生命故事微观叙事的再一次完美诠释了“崇高美学”内在特质,成为以文学手法书写屯垦戍边历史记忆、再现兵团人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

三

丰收的《西长城》是一幅布满新疆屯垦戍边历史记忆的景观地图,在这纵横交错、五彩斑斓的记忆拼图中,那些以口述史为鲜活素材的个案呈现,仿佛有意打破时序与空间,串联起兵团自成立至今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成为兵团记忆的当代文化生产范本。《西长城》借助评论干预、“图一文”叙事等叙述手法,在充分展示具有地域风情的屯垦文化传承的同时,讴歌兵团人“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无私奉献精神。

首先是对口述史素材的运用。丰收常常被认为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纪实文学作家,之所以这样描述,一则因为他三十余年一直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创作对象,用极富历史现场感和文学美感的笔触反映兵团几代人的生活状态;二则因为丰收的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坚持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人物、事件往往都出自于作家长期田野调研中采录的口述史料。《西长城》不仅在叙述中大量参照口述史,还有针对性地加以引用,旨在增强人物活动的在场感,不断激活人们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兵团屯垦戍边记忆。比如对“民族团结”口述史料的援引:湘妹子李腊梅是兵团第二代,在苦日子里与维吾尔族兄弟姐妹建立起深厚感情,买来木沙库至今回想起与李腊梅交往的点点滴滴,还是充满感激,“李家姐姐苦水里泡出来的,她知道穷人的日子该怎么样过,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给我们家人帮忙,最大的一个好人”^{[6]80}。此外是对兵团女性口述史料的广泛应用,作家在长年积累的口述采访中提炼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例,既有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张迪源、华淑媛、刘功辉、廖玉珍等,也有参与修筑乌库公路、挑战冰山雪峰的“冰峰五姑娘”,^①还有棉花地里成就的劳模江桂芳等。比如对“川妹子”张斗兰的个案展示:她遭遇过无法躲避的包办婚姻,丈夫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又追随丈夫到新疆兵团农场种地。张斗兰在劳动方面争强好胜,能让小伙子心甘情愿服输,后来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往南疆搬迁,她回忆当时南疆兵团农场的艰苦条件:“到四十五团

^①1957年3月,为了加快乌库公路施工进度,田桂芬、刘君淑、姜同云、陈桂英、王明珠等五位姑娘主动请缨,与男人们一道,硬是把威严的冰峰撕开了一个通车口,“冰峰五姑娘”的名字由此传开。参见李域《激扬巾帼志 建功新时代》,《兵团日报》,2019年4月15日,第6版。

的第一夜,带着三个孩子在一棵老榆树下睡了一夜,硬是地窝子也没有一间。水,咸苦咸苦,四个多月没有吃过盐。入了冬,去离家很远的河里拉冰化水吃。”^{[6]255}张斗兰刻苦钻研棉花种植技术,棉花亩产量接近吉尼斯纪录,先后荣膺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西长城》还特别叙述了苏联援华专家迪托夫等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该书从迪托夫依依惜别的场景写起,回顾他和王震、张仲瀚、陶峙岳等人之间的友谊。文本叙述具有电影特写镜头的画面感,“走到界桥中段,迪托夫突然转身跑了回来,紧紧拥抱住张仲瀚。张仲瀚感到热泪滴落在他手背上,他的眼眶也涌满了泪水”^{[6]85}。迪托夫不仅在八一农学院授课,还定期前往玛纳斯河流域指导种棉实践,将科学知识传播到亘古荒原,助力新疆屯垦戍边事业的发展。虽然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撤走援华专家,给困难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压力,但是中国人民仍然在节衣缩食中团结一心偿还外债。在历史的洪流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围绕国家利益发生变化,变幻无常,那些在特定历史进程中为之真诚奉献过的人们,尽管背影已然远去,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感人画面和动人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记忆之中。“历史的影像中还有迪托夫教授界桥一步一回眸的凝望;还有玛斯洛夫灯影里的白发,姑娘小伙手中露珠晶亮的沙克勒克花。”^{[6]96}

其次,《西长城》有效采取“图一文”叙事策略,在文本叙述中大量插入珍贵老照片,通过老照片的视觉冲击,一方面尝试复现历史现场,增强历史事件的真实感,另一方面帮助读者更全面了解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文本接受中提升对于新疆屯垦戍边伟业的认知。该书用三张图片配以文字叙述,概括出了“坎土曼大王”宋献银的一生。第一张照片是佩戴勋章的军装照,指向屯垦戍边之前的戎马生涯。第二张照片是收获果实时喜形于色的劳动照。第三张是扛着坎土曼的宣传照,宋献银因“一天开荒三亩地”的突出业绩受到表彰奖励,奖品就是一把坎土曼。又如为了呈现王震将军对水利建设的重视,该书特别选用了一幅老照片,尝试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1951年5月15日,“十八团渠”^①剪彩放水,王震像孩童般兴奋,跳进渠水高喊:“同志们,下来吧,把辛苦的汗水洗掉吧!”^{[6]27}照片中王震将军的动作姿态生动

传神,曾经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一代名将运筹帷幄、重视兴修水利工程的立体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女兵日常生活细节的展示,在“明月出天山”一节,用老照片讲述女兵们承担繁重劳动任务的同时,夜深人静时在帐篷里缝缝补补,做衣服,纳鞋底,照顾一家老小。

再次,《西长城》有意在叙事中穿插较大篇幅的评论干预,具体涉及对古代西域屯垦史的介绍、对兵团创立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势的分析以及叙述者对主题的升华。全书聚焦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但是以评论干预的方式将古代西域屯田史与当代屯垦戍边历史勾连起来,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屯垦通史叙述架构。在“古韵长歌”部分,叙述者用简洁的笔触勾勒出西域屯田历史基本状貌,“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大唐盛世,对西域的经营,丝绸之路的通达,基础在屯田,前提还是屯田”^{[6]46}。在叙述陶峙岳到棉田检查工作时,以评论干预的形式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的困难形势作了简短交代,阐明了新疆种植棉花的国家战略需求背景,“其中最为严重的困难就是缺乏足够的粮、棉,特别是棉花的不足,内地纺织工业已由于原料缺乏而停止了生产。为此,国家对新疆农业方面的要求就是,种出棉花”^{[6]16}。叙述者还试图通过恰当的评论干预进行主题升华,如针对盐碱地改造的绿色革命,“没有仰仗苍天,也不屈服命运,就靠一双龟裂的手,和盐碱争夺这块立足之地。军人们付出了太过沉重的代价。十年、一百年,时间越久历史越长才越明白,他们的牺牲太大太大,他们的给予太多太多”^{[6]31}。

最后,《西长城》旨在发掘地窝子等兵团屯垦戍边的典型文化符号,借助此类特殊媒介,一方面牵引读者走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兵团战士的生产生活,另一方面增强文本叙事的地域文化色彩,进而为兵团红色文化资源符号提供重要载体。“地窝子”常常是作为叙述线索,深层次呈现的则是特定个体的人生命运故事,比如书中收录的关于刘五十四(人名)的故事,他的妻子从甘肃老家来新疆找他,住进了地窝子,结果第二天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觉得地窝子还不如老家的洋芋窖子,后来上级领导安排两口子到连部驻地参访,结果看到战士们把地窝子收拾得井井有条,硬是让艰难的生存环境增添了诗意,刘五十四夫妇被深深打动,从此再无怨言,在地窝子扎根安家、生儿育女。地窝子

①部队引孔雀河水入吾瓦荒原的渠道,被王震将军命名为“十八团渠”。

既是兵团屯垦战士的栖身之所,也是这些远方游子在边疆的家园。这些艰苦的生活经历,如今早已化为兵团老战士心灵深处的个体记忆,携带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成为立足当下追怀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重要触媒。

结 语

作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丰收一以贯之坚持为新疆兵团屯垦戍边事业撰文作传。丰收以兵团为中心的纪实文学创作并非简单的复制记录,而是有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如《西长城》虽然以兵团的成立发展为线索,但是摆脱了线性叙事的窠臼,每一卷主题先行,再现了兵团建设过程中的诸多方面。同时运用了倒叙、预叙等叙事手法,以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西长城》中使用评论干预为读者提供更多背景信息,插入的多张老照片也带给读者强烈的视觉体验。丰收即便身处消费文化语境,但始终不被那些标榜“解构宏大叙事”“消解崇高”的后现代美学话语所宰治;而是坚守人文情怀,将个体的人生命运故事有机融入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丰收的纪实文学自觉塑造崇高美,试图还原屯垦戍边的历史记

忆,叙述中体现的真实感与在场感对于读者来说是十分珍贵的阅读感受。丰收注重田野民族志实践,从田野资料提炼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件,尝试对兵团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景式扫描,书写出一部部富有浓郁地域风情和军垦文化意味的纪实文学作品,成为名副其实的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歌者。

引用文献:

- [1] 张德明.报告文学的艺术[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337.
- [2] 姚晓敏.丰收的丰收[J].当代兵团,2018(17):52.
- [3] 范志俊.《西长城》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兵团文化园地百花争艳[J].当代兵团,2019(2):25.
- [4] 雷达.“西长城”的精神宝藏[N].文艺报,2014-12-19(05).
- [5] 沈苇.宏大叙事下的细腻讲述——评丰收《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J].新疆艺术,2018(5):32.
- [6] 丰收.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7]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第三版.谭君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2.
- [8] 刘志友.塑造崇高美——论丰收的新疆兵团叙事[J].南方文坛,2011(2):125.

[责任编辑:冯翔鹤]

The Sublime Aesthetics and Memory Landscape in Fengshou's Documentary Literature:

—— the Great Wall in Western China as an example

ZOU Zan, SONG Qi-yuan

(Xinjiang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Abstract: Fengshou, a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of documentary literature, has been adhering to humanism in his creation and focusing o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life and destiny stories into the changes of great history. Studying the Great Wall in Western China, which won Lu Xun Literary Prize, this paper, combining narrative analysis with cultural analysis, found that it is a landscape map full of historical memories of reclamation and garrison in the frontiers in Xinjiang. In this crisscross and colorful memory mosaic, the cases with oral history as the creative materials intentionally break the limit of time sequence and space and present a contemporary cultural production model of historical memory by threading up important events and figures sinc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was set up. Furthermore, with the help of commentary intervention and picture-text narrative techniques, this book eulogizes the selfless dedication of people in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in addition to a full display of the cultural remains of reclamation with regional customs.

Keywords: Fengshou, The Great Wall in Western China,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Sublime Aesthetics, Memory Landscape